

# 議政型自由主義一例： 潘光旦

• 呂文浩

## 引子

從自由主義者與政治、政權距離遠近看，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不外三種類型：參政型、避政型、議政型。一、參政型：這批人在行動上與專制權威妥協，在感情和理性上認同自由主義。如蔣廷黻、丁文江、王世杰等參與政府，胡適在1938-1942年出任駐美大使，1946年張君勱脫離民盟組織國家社會黨、加入國大等<sup>①</sup>。二、避政型：這批人對現實政治不滿，潛心學術研究，不談政治，有深沉的自由主義氣質，多抱學術救國、教育救國立場。如陳寅恪、金岳霖等<sup>②</sup>。三、議政型：如胡適、羅隆基、儲安平、張季鸞、潘光旦等。胡適在《新月》和《獨立評論》時期對國民黨政府的抗議，實質上並未脫離「個人諫諍」的底色，抗戰以後乃至整個40年代對國民黨政府的辯護並不意味着他喪失了自由主義立場，只不過是抗議精神的由強轉弱，容忍精神的逐漸加多罷了。儲安平主編《觀察》、張季鸞任《大公報》總編輯，均是以職業報人的身分不左袒不右袒的議政。雖然張季鸞曾力主「國家中心論」，但他一直沒有依附政黨，總是竭力維護新聞自由與客觀。潘光旦長期在大學任教，學問淵博，他出於對思想自由的追求和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而議政。潘光旦的議政型自由主義集中表現在政學關係上。本文試圖以潘光旦在政學關係上的經歷與在政學關係問題上的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為例，具體剖析潘光旦的心靈歷程與歷史命運。

從與政治、政權距離遠近看，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不外三種類型：參政型、避政型、議政型。參政型在行動上與專制權威妥協。避政型對現實政治不滿，多抱學術救國、教育救國立場。議政型如潘光旦長期在大學任教，學問淵博，他出於對思想自由的追求和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而議政。

## 一 潘光旦政學關係的歷史考察

潘光旦於1913-1922年在清華學校求學。那時他不僅以愛讀書出名，還積極參加學校的各種社團活動，很關心社會政治問題。1921年他曾參加抗議北洋政府對教員欠薪的同情罷課，在校內的罷考中不畏威逼利誘，寧肯犧牲出洋機

會也不妥協，這使他的同學聞一多佩服不已。1923年，潘光旦參加了羅隆基等發起的國家主義團體「大江學社」。該社鼓吹「對內實行改造運動，對外反對列強侵略」。儘管大江社不贊同共產主義的主張，但其初衷卻是以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厚感情來呼籲人們爭取國家民族獨立，這無疑屬於本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探索救國之道的一種努力。1925年，孫中山先生去世後，留美學生在紐約舉行紀念會，潘光旦與聞一多等一起參加了這一活動。潘光旦為紀念會翻譯了孫中山的遺囑，還和另一位朋友合譯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sup>③</sup>。

1926年潘光旦學成回國。此後的七、八年間一直在上海地區各大學任教，教讀之餘，還參加了《中國評論周報》、《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書報春秋」、《新月》等報刊的部分編輯工作，主編《優生》月刊、《華年》周刊。這一時期，潘光旦除了撰寫學術論著外，還寫下了一些關於青年、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時評。這些時評均極少直接涉及政治問題。

《新月》的主要負責人先後是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sup>④</sup>，刊物周圍聚集了一批自由主義者。《新月》同人並不是一個學術思想高度一致的團體。刊物一再聲明，他們在許多具體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但是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理想，如思想自由、保持容忍的態度（對不願容忍、不能容忍者除外）等<sup>⑤</sup>。潘光旦參加了《新月》第2、4卷的部分編務，他在《新月》上發表的10篇文章均是有關社會、民族問題的學術論文或短評。他不像梁實秋發表了大量的文藝稿和時論稿（共38篇），大力呼籲思想自由，還和魯迅打了一場有名的筆仗；比起胡適、羅隆基一篇又一篇尖銳批評國民黨當局的政論，特別是「人權問題」所掀起的軒然大波，潘光旦的確顯得十分沉默。他在《新月》上發表的社會科學論文或短評，從思想史的角度看，主要是對當時激進思潮的批評，強調以冷靜、嚴肅的態度來研究社會問題，以及恪守學術的自由與獨立，是從另一側面昭示出《新月》同人的共同理想。

40年代，潘光旦先後擔任民盟的要職。正如當時許多參加民盟的知識份子一樣，潘光旦希望民盟的出現能夠調解國共雙方的對峙，造成一種多黨政治的局面，從而達到建設民主政治的目的。

潘光旦主編的《華年》周刊羅列了12條「本刊的態度」，如「不懂得甚麼是『時代的動向』——卻甚相信循序改進的道理」、「不會唱徹雲霄的高調——但求腳踏實地的走去」、「不借重黨政要人的題贊——卻歡迎一般讀者的獎勵與規正」<sup>⑥</sup>。這些話所透露出來的冷靜、超然的態度，「經驗主義的觀察方法和對於成套頭的哲學系統的鄙視」<sup>⑦</sup>，都與他在《新月》中的態度息息相關。

抗戰時期，在深重的國難刺激下，潘光旦的政治態度日趨積極（思想傾向與以前一脈相承）。他寫下了大量思維縝密、文筆犀利的政論文，這些文章大量引經據典，有濃厚的書卷氣，表現了作者融會古今、貫通中西、打通文理的淵博學識。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些政論主要是對國民黨黨化教育、壓制思想自由的抗議，對知識份子關心國事的呼籲。自由主義的時代強音在潘光旦這裏集中在教育思想文化方面，無疑是得其所長，格外的震聾發聵。

40年代初，羅隆基受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委托，將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許多教授吸收入民盟。潘光旦、吳晗、楚圖南、費孝通、聞一多等先後加入，使民主同盟在各界特別是知識份子中的聲望大大提高。潘光旦先後擔任民盟的昆明支部主任、雲南省支部財務委員、中央常委等職<sup>⑧</sup>。正如當時許多參加

民盟的知識份子一樣，潘光旦希望民盟的出現能夠調解國共雙方的對峙，造成一種多黨政治的局面，從而達到建設民主政治的目的。潘光旦身居民盟要職，卻對實際政治活動沒有直接的興趣。在政學關係上，他走了一條以議政為主的道路。

抗戰時期，潘光旦加入民盟以及寫下大量精彩的政論，無疑起因於時代思潮的重大衝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個固守書齋的自由主義者，此後便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議政型自由主義者了。抗戰時期是他一生政學關係上的分水嶺。

聞一多遇害後，潘光旦、費孝通等躲進美國領事館避難，一時成為各報刊的頭版頭條人物。這時期他寫了一首長詩，表達了對摯友聞一多遇害的無比憤怒和對國民黨政府的極大失望。詩中寫到：「含悲莫訴幾覆盆，天涯累累涕泗痕。伊誰發願此平反，富強長策且勿論。治國總由治人始，良相功同古所擬。顛而不扶焉用彼，何況殘民溝壑委。」<sup>⑨</sup>

此後，潘光旦同以前一樣，繼續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不斷議政，依然是書生氣十足。潘光旦是著名的自由主義刊物《觀察》最受歡迎的四、五個撰稿人之一。他在《觀察》上發表的大量文章多屬學術專論，這些嚴謹的學術探討寄託了他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特別是對時局的種種看法，更是溢於言表。他所關心的問題多屬關乎根本的思想認識問題，極少涉及具體操作。在《世紀評論》、《新路》等自由主義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也多為此類。

1949年以前，特別是在抗戰以後，潘光旦是公認的自由主義左派，是當局的眼中釘。1949年以後，以潘光旦的自由主義信念和耿直的性格<sup>⑩</sup>，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自然免不了厄運。他很早就被批判，思想改造的檢討好幾次沒通過。再以後就是因被劃為羅章同盟的核心人物之一而戴上了右派的黑帽子。1949年後的潘光旦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大膽的議政，卻仍然免不了橫遭迫害的命運。以潘光旦對學術研究的興味之深，不難想像，他會對那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何等的厭惡。事實上，他一等政治局勢稍稍平靜下來，便抓緊時間投入到學術研究中去。

抗戰時期，潘光旦加入民盟以及寫下大量精彩的政論。在此之前，他固守書齋，此後便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議政型自由主義者了。抗戰以後，潘光旦是公認的自由主義左派，是當局的眼中釘。1949年以後，以潘光旦的自由主義信念和耿直的性格，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自然免不了厄運。

## 二 觀點之一：「宣傳不是教育」

1927年，潘光旦在〈孔門社會哲學的又一方面〉這篇學術論文中，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來揭示孟子人性論的內在矛盾。他認為孟子「是一個學者，他更是一個改革者」，改革者在學說之外，還要宣傳主義。主義在改革中固然少不得，但主義蘊含有許多危機，其一是易流於武斷、抹殺常識與事實，其二是感情用事。這是在純粹的學術研究中分清主義與宣傳，尚不涉及對時局的批評<sup>⑪</sup>。在我所接觸的材料中，潘光旦最早是在《蘇俄之真相》一書的書評(1929)中表達了對當時「宣傳即教育」、「我統即道統」的批評<sup>⑫</sup>。「宣傳即教育」是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的結果。這一做法在抗戰時期得到加強，「宣傳」聲浪一時甚囂塵上。潘光旦連續寫下了〈論宣傳不是教育〉(1940)、〈再論宣傳不是教育〉(1940)等一系列文章，詳細闡發了自己的看法。

宣傳與教育的關係，是20、30年代歐美思想家、社會學者、心理學者，尤其是社會心理學者致力研究的問題。潘光旦所主張的「宣傳不是教育」這一看法即從這些成果中借鑒而來，特別是美國學者拉姆利(F.E. Lumley)著的*The Propaganda Mena*和英國教育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Ends and Means*。潘光旦在1943年看到赫氏的書，感到這本書「大而至於一般的自由教育的見解，小而至於宣傳足以為自由教育的一大障礙的看法，赫氏的話真是每一句『實獲吾心』」<sup>⑬</sup>。他翻譯了書中關於自由教育的部分，題之為「赫胥黎自由教育論」，交商務印書館出版。

「宣傳不是教育」既是自由教育論(liberal education)觀點，也是自由主義中的應有之義。以自由教育論的角度看，宣傳猶如商業廣告，把本來不相關聯的意象牽強附會的聯繫起來，目的只是企圖讓人信服宣傳者的主張。所以，教師應對報刊、電台上流行的名詞逐一解釋，讓學生看到這些名詞的本來面目。這就是「意念的解釋」。從自由主義的角度看，宣傳本身並不改變宣傳的性質與效用，問題是一切宣傳都為同一目標服務——把所有宣傳工具都協調起來朝一個方向影響個人，並產生出特有的全體人民的思想「統一性」。正如米哈依洛·尤里奇指出，宣傳是政治用來實現其目標的形式之一，為了盡可能使人們牢記一種社會改革方案的基本要求，他成為那些陳舊的口號和簡化了的公式的一種有條理的、系統的傳播。它更多地訴諸情感而不是理性，淡化、減弱和窒息着批判思維<sup>⑭</sup>。總之，宣傳足以成為自由教育的障礙，足以為自由主義的障礙。

「宣傳即教育」是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的結果。潘光旦連續寫下了〈論宣傳不是教育〉等一系列文章。他認為，宣傳的方式是灌輸，教育的方式是啟發；宣傳的目的是使人信服自己的主張，教育的目的是啟發人「自得」。

潘光旦認為，宣傳的方式是灌輸，教育的方式是啟發；宣傳的目的是使人信服自己的主張，教育的目的是啟發人「自得」。因此，二者實在不是同一回事。宣傳固為政治侵入學術，其害處還在於它同識字運動、專門技術教育結合起來。識字只能教人讀而不能教他讀甚麼（即沒有教他理智的判斷力），其結果是使大批民眾成為政治宣傳的魚與雀。專門技術教育不重視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使專家圍限在自己的行業內，當他們一跨出行業半步，稍一涉獵社會政治問題，便成為政治宣傳的獵物。「他一些海闊天空的議論，往往一大部分是有意無意間從宣傳方面拾的牙慧」<sup>⑮</sup>。

當〈宣傳不是教育〉發表後，昆明版的《中央日報》馬上發表題為〈教育家的大責重任〉的社論，不點名的批評了潘光旦。潘光旦看到這篇社論後，很快又撰寫了一篇〈再論宣傳不是教育〉，一開頭就說：「從表面上看，它是和我的文字沒有甚麼關係的，實際上卻是針對着我的一個答覆。」<sup>⑯</sup>還說：「我說宣傳不是教育，多少還說了一些為甚麼不是。那篇社論說宣傳就是教育，卻沒有說為甚麼是。」<sup>⑰</sup>這些言論表現出一位正直剛強學人的過人膽識。

潘光旦針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潘公展在〈教育上兩個迫切問題〉一文對進步教授思想問題的指責，發表了〈異哉所謂教師思想問題者〉(1940)，有力的駁斥了反動當局。他在分析了教自然科學的大學教師沒有「思想問題」後，着重論述了教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大學教師與三民主義的關係。他指出，這部分大學教師儘管和三民主義比較有關係，但並不像潘公展所期望的那麼密切。他們對各派理論持客觀態度，只予以介紹與評論，而決不用宣傳與灌輸的方法。

他們對三民主義的貢獻是充分肯定的，對三民主義也沒有甚麼成見。這種自由主義的態度與國民黨政府所期望的顯然不同，潘光旦說：「不過就研究與教學的方法與態度說，我們也不妨坦白的說，便絕不是一般信仰三民主義的人所有的或所期望於它的人的了。」<sup>⑮</sup>他還提出，三民主義目前走了一個路口，一條路是宗教化，一條路是真正的思想化。前者是絕路，後者是活路。

潘光旦對國民黨政府壓制言論，以主義妨害學術自由的批評是很深刻的。他反對把三民主義定於一尊，主張各種學說並存，這裏自由主義的觀念昭然若揭。海耶克(F.A. von Hayek)說：「使思想獲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的知識和不同的見解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理智的成長就是一個以這種分歧的存在為基礎的社會過程。」<sup>⑯</sup>潘光旦所追求的，正是這樣的境界。「教育領導政治，還是政治控制教育，這是一個頗有爭論的問題」，自由主義者均選擇前者。如楊人梗在1948年指責黨化教育禁錮思想，認為「教育的功用在於延續及增進人類的文化，政治是被包含在文化裏面的，甚麼樣的文化產生甚麼樣的政治；文化領導政治，故教育亦當領導政治」<sup>⑰</sup>。學者和政治家各有各的考慮，從政治家的方面看，學者的主張不切實際、書生氣十足，根本不可能進入政治運行中發揮作用。

### 三 觀點之二：「學生不宜加入政黨」

潘光旦是最早提出這一主張的人。早在20年代末，他就在《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上寫過〈釋「讀書不忘政治」〉一文。他認為，一般有生計業務的人不宜都往政治這條路上擠，對於尚在預備時期和培植時期的學生，社會不宜責成太深，只須指望他們能對當代的政治狀況加以精密的觀察。雖然並非人人都是「政治動物……卻都是政治社會的一份子，多少休戚相關的」<sup>⑱</sup>。1930、1931年間，潘光旦和朋友們在《中國評論周報》、《新月》上再次討論到這個題目。

潘光旦在光華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曾遇到在校學生以區黨部的身分到教授家裏搜查反動書籍，並且對副校長拍桌子的事情。此事對他觸動很深，當時他在《華年》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措辭很嚴厲的批評(1932)，多年以後還一再在著作中提及此事。沉默了幾年以後，他又在《今日評論》上發表〈學生入黨問題〉一文(1940)，致使該刊被查封。再以後，他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時提到這個觀點。

潘光旦這一觀點主要針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政策，也有反對其他政黨包括共產黨在大學裏爭取青年的用意。他不僅反對學生在校內從事政治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亦不贊成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所希冀的，是把大學辦成能超脫各黨派、各種政治主義紛爭的一塊淨土，把學生培養成對政治採取超然態度的士人。在當時，持這種自由主義立場的不乏其人。如馮友蘭主張在學校內「學術空氣與政治空氣不能並存」，勸學生「奉公守法」，不要「作大規模的政治與社會運動」<sup>⑲</sup>。這種態度不僅開罪了國民黨當局，也受到共產黨的攻擊。

潘光旦之所以主張「學生不宜加入政黨」，反對政治勢力侵入教育領域，是

潘光旦不僅反對學生在校內從事政治活動，亦不贊成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所希冀的，是把大學辦成能超脫各黨派、各種政治主義紛爭的一塊淨土，把學生培養成對政治採取超然態度的士人。這種態度不僅開罪了國民黨當局，也受到共產黨的攻擊。

由於他認為青年學生對政治問題缺乏成熟的判斷力，特別容易被形形色色的「宣傳」蠱惑。至於教師則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從志、情、意三方面把學生培養成一個能夠獨立思考、判斷政治問題且不被「宣傳」左右的士人。

潘光旦希望學生與政黨政術絕緣，而絕不是與政治絕緣。他說<sup>23</sup>：

學生應當注意政治，研究政治，密切的觀察政治，以至於對當前的政治措施作公開討論、鄭重的批評、和嚴正的主張——這些都是他的本分……。

不僅如此，抗戰期間，他經常出席聯大師生舉辦的各種時事問題座談會，還應邀為學生作政治問題的報告。

把政黨與政治分開是潘光旦這一主張的關鍵。他認為，從廣義上講，政治是群居生活的全部，其目的是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取得調和。「近來有人替政治給一個最簡單的定義，說政治就是一種業務，一種管理眾人的業務，好好的做這業務就是了，於主義乎何有？」<sup>24</sup>他還說：「民主政治是不言主義的，是搬不出成套的教條而責人非一體信守不可的。」<sup>25</sup>民主的實質是以科學的、客觀的精神來處理事務。政黨是言主義的，一言主義，就充滿了「我執」的偏見。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思想統一，把三民主義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強人信仰。所以，潘光旦認為學生加入政黨，不僅僅是政治勢力侵入教育領域，而且還會養成偏蔽的思想習慣。

只有在學習期間養成健全的思想習慣，對自由主義有深徹的理解，以後才能不被各種流行的浮泛政治主張牽着鼻子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為學生成長為自由主義者培植深厚的根基，與胡適所強調的不迷信各種主義、形成獨立的判斷能力，在方向上如出一轍。

不難看出，潘光旦對政治的理解是理想化的，對政黨有着自由主義學者本能的排斥。在近代政治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政黨作為特定階級、階層的利益代表者，往往能夠更有效的展開政治鬥爭。企圖消弭政黨作為特定利益代表者的作用，即去掉「我執」，是辦不到的，只能是潘光旦一廂情願的想法。在國共內戰前夕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潘光旦曾呼籲各黨黨員不要只站在本黨利益的立場上講話，要「毋我」。其實質是以個人思想自由、以代表全民利益來肢解實體意義上存在的政黨。潘光旦主張的「學生不宜加入政黨」，只有微弱的回響。

潘光旦對政治的理解是理想化的，企圖消弭政黨作為特定利益代表者的作用，即去掉「我執」。在國共內戰前夕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潘光旦曾呼籲各黨黨員不要只站在本黨利益的立場上講話，要「毋我」，但這只能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 四 觀點之三：「學人論政」

胡適曾說，知識份子對政治要有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他自稱除了任駐美大使四年外，一生甚少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他認為這是知識份子對社會的一種應有的責任<sup>26</sup>。這句話很有代表性，恰切的說明了中國現代自由主義者在政學關係上的一種態度。潘光旦在〈一封給大學生的

公開信)(1934)中提出 disinterestedness、detached interest 兩個詞，他譯為「超然的興趣」<sup>27</sup>。這個提法明顯是為學生而提的，但何嘗不是他自身的寫照呢？他對政治沒有直接的興趣，故選擇了議政的道路。

潘光旦認為學人對政治不聞不問，只逃避到自己的專業領域裏去，是以「專責對通識」，是自甘於做新式的隱士。「學人與藝人但知他們是學藝之人，而忘卻他們是人，是興亡有責的匹夫，但知他們有學藝的專責，而忘卻他們更有國民與論政治的通識」<sup>28</sup>，而且學人之隱，是明知故犯，比起其他各界來最不能讓人原諒。潘光旦還特別提到當時大學教師對政治的冷漠，與學生的熱心形成鮮明的對比。他認為教師在這方面失去了督導之責。

在1944年七七紀念會上，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說他之所以參加紀念會，是因為他以為這個會是學術性的。他認為大學師生應該堅守學術崗位，不應該問政。當時潘光旦、聞一多均在座，聞一多在會上很憤激的批評了熊慶來的觀點。潘光旦表示熊慶來的觀點令他「大惑不解」，會後他寫下了〈說學人論政〉一文。他認為學人論政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傳統，孔孟以降的先哲之所以值得景仰，決不僅僅在他們是學術家，而在他們是政論家，不議論即不足以收輔導與督責之效。他尤其欣賞顧亭林對外甥的教導：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臨山水；有濟世安民之志，而後可以考古論今。

但問題是，潘光旦為甚麼獨獨拈出論政的傳統而排斥隱士的傳統呢？這恐怕一方面是性情所致。潘光旦生性活潑、開朗，屬於入世者流，缺乏感傷飄逸或恬淡無爭的氣質。以這樣的性情，大概很難選擇隱士傳統。另一方面，也與他的自由教育論立場有關。自由教育論強調教育應重視通識，注重社會人生的經驗，而不僅僅是課堂的知識傳授。受教育者要成為一個對世界文化大勢有所了解，關心國事，知書達禮的士人。潘光旦站在自由教育論的立場上，得出批評性的結論<sup>2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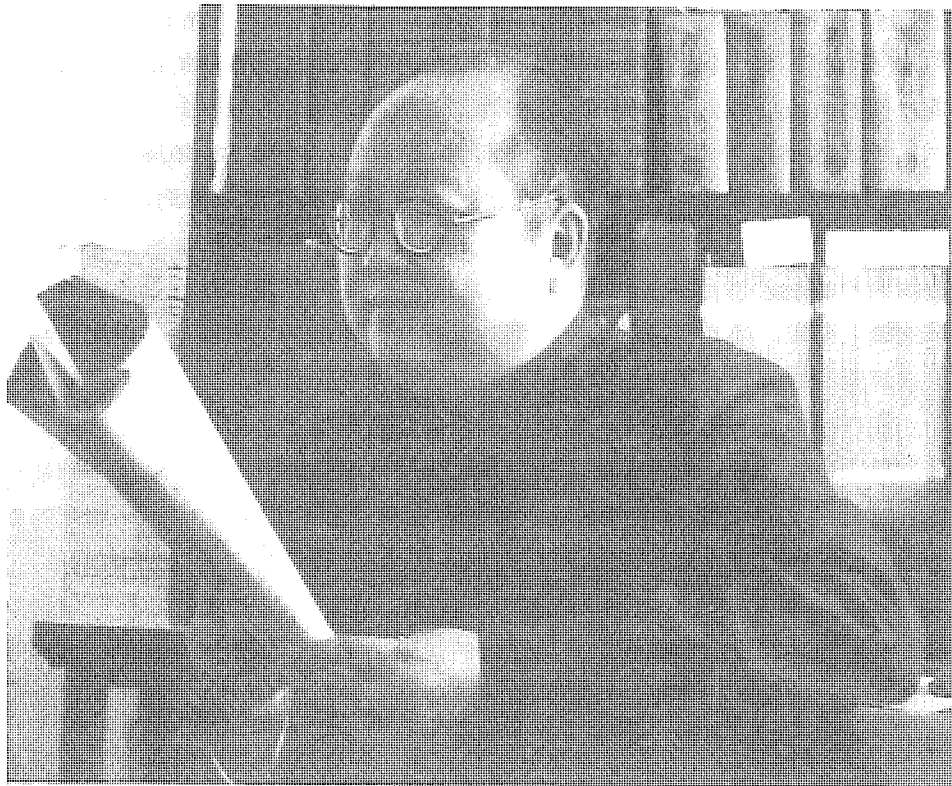
沒有做一個完整的人的意識的專家，無論他的專業如何精深，他終究是一個匠人，學術家也罷，泥水匠也罷。沒有政治意識的專門人才，可以加入偽北京大學，可以到淪陷區做順民，而無害其為專門人才，學術家也罷，泥水匠也罷。

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學府是輿論清議所從出的最好機構；清明的政治以學術為張本，學人不議政，誰還更有資格來議政呢？

潘光旦對中國傳統士人精神有深徹的認識，在學人論政這點上，他是傳統精神的傳承者。他與傳統士大夫的不同處在於，他還是一個生活在大城市中的自由流動職業的現代知識份子。按照思想史家張灝的看法，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產生於戊戌維新時期。儘管傳統士大夫同國家經常存在着緊張矛盾，但是由於兩者的利益和思想信仰的牢固聯繫，常使士大夫依附於國家，所以他們未必是政府的批評者。而現代知識份子本身所代表的，有可能是超脫一己階層利益的對全社會自由、公正的追求。他們對政府提出的要求往往比傳統士大夫多，但他們的政治支持遠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們同國家之間是一種緊張而不是

在1944年七七紀念會上，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表達了大學師生應該堅守學術崗位，不應該問政的看法。當時潘光旦、聞一多均在座，聞一多在會上很憤激的批評了熊慶來的觀點。潘光旦亦表示，熊慶來的觀點令他「大惑不解」。

潘光旦的政論和專業結合得特別緊密，可說是其學術思想的延伸。與胡適、羅隆基相比，他的書生氣更濃。他所談論的多是一些思想認識問題，關乎根本，難怪研究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學者很少提到他。



同命運的關係<sup>③</sup>。潘光旦是一個承襲傳統士人某些精神的現代知識份子，他之所以議政，正是由這兩種精神相混雜產生的社會責任感所引發的。

## 五 對潘光旦議政型自由主義的評論

議政型自由主義者多是觀念人物，鮮有表現出很強的政治行動才幹。胡適、羅隆基等對具體政治問題很感興趣，提出的措施也較具體，但是卻脫不出知識份子的理想設計狀態，表現出很強的書生意氣。誠如唐德剛所說，適之先生在理論上無一不對，在實踐上無一不錯。潘光旦連具體的政治問題都很少涉及，常常以一個政治問題為引子，大事闡發其學術思想，到頭來也不提具體措施。他的政論和專業結合得特別緊密，可說是其學術思想的延伸。與胡、羅相比，他的書生氣更濃。他所談論的多是一些思想認識問題，關乎根本，難怪研究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學者很少提到他。從書面上看潘光旦對現實政治問題所提的某些方案很能兼籌並顧，亦能注意到配合本土情形，而且循序漸進。但是，歷史的進程往往受時代思潮的鼓盪，因而展現出不盡合理而且是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所以，從學理上講，潘光旦的主張不乏合理性，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張本，值得認真吸取。但他的主張之所以被現實冷落，是由它本身的特徵決定的。

從嚴格的自由主義理論來看，潘光旦自由主義方面的著述基本上局限在教育思想文化領域(上文提到潘光旦的三個代表性觀點即是顯例)，極少涉及到政治經濟方面。雖然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自由主義著述得其所長，有一定深度，



但仍不夠全面和系統化，沒有很強的理論自覺。這是由於中國自由主義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大環境所致。殷海光曾經深刻的指出<sup>①</sup>：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發出了一些動能，一方面是由於受了時代思潮的重大衝擊，另一方面是因為受了愛國熱情的鼓舞。

潘光旦一直站在書生的位置上議政，他並不想介入現實政治，議政的同時還在留戀着自己那一方正在耕耘的學術田地。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潘光旦在抗戰以後才成為一個比較典型的議政型自由主義者，此前，他主要是一個固守書齋的自由主義者。

議政型自由主義者與參政型和避政型的自由主義者相比，對現實政治似乎還要積極些，卻始終沒有組織起一個地道的「自由黨」（民盟只是一個缺乏自由主義者熱情支持的鬆散聯盟而已）。潘光旦始終甘居於議政而且主要是思想文化方面的議政的地位。這種文化自由主義——容忍的精神與批評的自由——誠然是思想文化發展的生命線，卻根本無力處在左右夾攻之中而應付自如，更無力承擔起建設民主自由國家的使命。胡適曾被認為是組織自由黨的合適人選，但胡適更適合於當學者而不是政治組織者，而且他與蔣介石的親密友誼也妨礙了他扮演這樣一個角色<sup>②</sup>。不過，從根本上說還是殷海光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八個字來得深刻。當時中國沒有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專責自由主義者是不公平的。換個角度來看，自由主義者的言論在當時雖然不可能實現，但其中所蘊涵的合理性因素卻是有價值的，值得後人繼承發揚。另外，議政型的自由主義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的心態，使他們在學術上有頗多創獲，在學術史上也是值得肯定的。對潘光旦的政學觀，也應作如是觀。

議政型自由主義者與參政型和避政型的自由主義者相比，對現實政治似乎還要積極些，卻始終沒有組織起一個地道的「自由黨」。胡適曾被認為是組織自由黨的合適人選，但他與蔣介石的親密友誼妨礙了他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 註釋

① 關於張君勱的「組黨介入型」，詳見陳儀深：〈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1941-1949)〉，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23卷下(台北：中央研究院，1994)。

② 關於避政型自由主義的觀點，乃是受我的導師胡偉希教授啟發所得。

③ 1940年，潘光旦在〈異哉所謂教師思想問題者〉一文文末還提到這件事。他說：「作者追提到這一點，無非要表示他對國民黨和黨義並無成見，以前如此，現在還是如此，也因為沒有成見，才有興趣提出這樣一篇文字來。」這個說法應是可靠的，並不是潘光旦怕國民黨政府追查而作的表白。引述這句話還表明，潘光旦對政治的興趣確實是超然的，態度是一貫的，這一點將在下文詳細論述。

④ 這是我對《新月》各卷版權頁上列的編輯者進行查閱，再根據刊物上的重要文章推論的結果。

⑤ 詳見《新月》創刊號上的〈新月的態度〉，以及第2卷，6、7號的〈敬告讀者〉。

⑥ 見《圖書評論》，第2卷，第6期(南京國立編譯館，1934)的介紹。

⑦ 這句話出自卡瑞爾(A. Carrel)之口，潘光旦對這句話加了註釋，表示贊同。見潘光旦著：《自由之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頁88-89、93。

- ⑧ 民盟中央文史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簡史：1941-1949》（北京：群言出版社，1991），頁14。
- ⑨ 全慰天：〈潘光旦先生的一首遺詩〉，《校友文稿資料選編》，第2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 ⑩ 梁實秋說潘光旦性格「外圓內方，人皆樂與之游」。見梁實秋：〈清華七十〉，載《傳記文學》，第39卷，第2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從潘光旦的生平事跡來看，他很講原則，厭惡趨時附勢。在1949年後寫的文章中，他沒有輕易否定自己以往的學術觀點，沒有無原則的引用馬列主義詞句來亂比附。我歷來主張在思想史研究中注重人物的性格分析。我以為，潘光旦性格的「內方」是他不肯輕易放棄自己主張的內在原因，因此潘光旦的檢討總是不痛不癢。難獲通過，正是意中之事。他不像羅隆基、梁漱溟、儲安平等採取激烈的反抗，也許與他性格中「外圓」的一面不無關係。潘光旦在1949年後主要從事民族學研究和翻譯，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是《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三聯書店，1952）、《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研究集刊，1955）、《開封境內的猶太人及其歷史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譯著有恩格斯的《瑪爾克》（《新建設》1952、1953）、萊納斯·保林的《不再要有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本書為《資產階級社會學論著選》第3輯，署名閔淵。這個歷史事實已鮮為人知。承蒙當時曾參與其事的現北京大學歷史系劉桂生教授告知，特此致謝〕、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與胡壽文合譯，商務印書館，1983）。由此可以看出，潘光旦自1949年後已在一定程度上「向內轉」，其心境如何大概要從他晚年的日記中才能了解，在此只好暫付闕如。值得玩味的是潘光旦在1949年以後已不復有機會談他鍾愛的優生學、生物學方面的主張，卻選擇了翻譯《人類的由來》。據費孝通先生的「書後」，潘光旦譯《人類的由來》大概是不滿當時的專才教育，希望中國能夠出現像達爾文一樣學識淵博的一代大師。
- ⑪ 見《留美學生季報》，第11卷，第4期（1927）。
- ⑫ 《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上海，1931）。
-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見註⑦，《自由之路》，頁228；236；229；229；103；355；364。
- ⑳ 參見徐崇溫主編：《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
- ㉑ 〔奧〕海耶克著，滕維藻、朱宗風譯：《通向奴役的道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158。
- ㉒ 楊人梗：〈教育的濫用〉，載《新路》，第2卷，第3期（北京，1948）。
- ㉓ 此文現被收入《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31-33。
- ㉔ 參見清華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編：《清華大學校史》（送審稿）（北京：清華大學，1963），頁117。
- ㉕ ㉖ ㉗ 潘光旦：《政學罪言》（上海：觀察社，1948），頁203-204；228；229；181。
- ㉘ 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頁40。
- ㉙ 參見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390-91。
- ㉚ 殷海光：〈自由主義的趨向〉，《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頁19。
- ㉛ 參見Young-Tsu Wong: "The Fate Of Chinese Liberalism—Chu Anping And His Circle, 1946-1950", *Modern China*, vol. 19, no. 4 (1993).